

不拖不躲,真相才能跑赢谣言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刘中扬

连日来,舆论高度关注的“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让路风波”,随着广西防城港市委、市政府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、当事人李先生接受道歉,暂告一段落。

回顾这一过程,一起村道上的纠纷,最终演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高热话题,引人深思。因为真相的供给问题,公众对“她是谁”的疑问越来越深,出现的谣言更伤及与事件无关的“无辜路人”。类似这样的事件,对真相应当体现什么样的时度效作出了深刻提醒。

舆情的背后是“事情”。真相的时度效,说到底就是以真实、及时、可靠的信息,筑牢社会舆论与心态的稳固基础,就是在热点事件与社会情绪的互动中,理解公众对真相的较真,回应公众对真相的期待,就是以“零容忍”

的严肃态度核查事实,不枉不纵,以阳光驱散阴霾,以公信凝聚共识。

从现实情况看,现在的一些真相往往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有的是观望心态重,水不烧开,不会想着关火,“踢到钢板”才正视问题,舆论发酵才慌忙行动,猜测四起再碎片化回应;有的是“拖躲”惯性大,错误地以为不出场、不回应,时间会自然地让舆情降温,公众情绪会慢慢降火;有的是能力水平不足,缺乏足够的担当、有效的方式与舆论打交道,新办法不会用,老办法不管用,硬办法不敢用,软办法不顶用。被“逼”出来的真相,很容易陷入被动,即使最终能一锤定音,平息风波,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大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,“有的人反应迟钝,信息发布跟不上,真理还在穿鞋,谣言已经跑遍天下”“有的时候网上讨论得热火朝天,各种误

读已经传播甚广,但有关部门的回应千呼万唤始出来,犹抱琵琶半遮面,甚至千呼万唤不出来,不是半遮面而是全遮面”……谆谆告诫,切中要害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提出,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,改革信号,意蕴深刻、清晰明了。

真相供给背后,有澄清谬误、明辨是非之责任,显端正价值、维护公平之担当,见化异聚同、凝心聚力之水平。过去是人人都有麦克风,现在是小事也会成为“现象级”,深刻认识到这一点,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就不会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;网络世界既生繁花,也长稗草,舆论场的自发性、突发性、多元性、无界性突出,清晰看到这一点,就会对真相供给的主动性多一些敬畏与重视,少一些打太极、躲猫猫、和稀泥、

拖字诀。

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人,互联网普及率达79.7%。从早上起床,到午间休息,再到晚上睡前,甚至更深半夜,有多少人在看短视频,刷朋友圈,留言发声……中国网民的普通一天,构成了互联网时代舆情生成过程的一个切片。信息的生产、扩散、接收,观点的表述、传播、汇聚,就像一个有着无限量插孔的插座,能让无数人建立联结,就像是浪花的激荡、云朵的交汇,可说是风生水起,也可说是喧嚣四起。

反复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那番话语,“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,不断推进工作理念、方法手段、载体渠道、制度机制创新,提高用网治网水平,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”,我们不能不看到主动、及时、权威的真相供给所承载的社会治理之重、民心关切之深,因其如此,须臾不可忽视。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

每年3600元,连续发放3年,而且不分一、二、三孩——这笔总额高达900亿元的育儿补贴,将于8月下旬正式到账,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。

作为一项全国性、普惠式经济补贴制度,育儿补贴充分体现了“投资于人”的政策意图。在看到育儿补贴降低家庭育儿成本的同时,也应意识到育儿补贴并不是“万能钥匙”,激发婚育意愿不能依靠补贴实现单兵突围,还需打好政策组合拳,营造良好的生育友好氛围。

结婚、生娃是人生大事,也是民生大事。从婚姻登记“全国通办”,精简证明材料,到包括湖北省在内实行异地生育出院直接报销,免垫付、零跑腿,一些与婚育相关的政策悄然实行,体现了国家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上的务实举措。有人算过一笔账,除了每年3600元的基础育儿补贴,从怀孕到生娃的全流程里,还有产检补贴、生育津贴、男方陪产津贴、新生儿育儿退税、地方生育奖励金等可领取,为不少家庭大大减轻育儿压力。围绕激活婚育意愿,政策层面正在多重发力。

事实上,在养育负担中,育儿的经济成本只是一个方面,还有育龄妇女职场权益保障、普惠托育服务不足,以及育儿假期落地难等现实问题。尽管我国劳动法明文禁止性别歧视,但职场中女性因为生育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依然存在。一方面,国家从假期、补贴、医保等方面为育龄妇女提供更多保障。另一方面,一些用人单位施以各种隐性压力,导致女职工怕因为生孩子丢了岗位,怕因为照顾孩子花精力而影响晋升,而本应享有的育儿假期更是难以兑现。可以说,在育儿的经济成本之外,还有更重的社会成本、职业成本。这应成为进一步改进的方面。

人口问题是国之大事,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。生了,没人带怎么办?孩子多了,住不下怎么办?生育补贴之外,有的地方因地制宜推出购房优惠,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,着眼于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。在教育领域,为缓解家长的焦虑,不少地方想尽办法均衡优质教育资源,推行教联体形式,给学区房降温,给家长教育投资减负。把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做全、做细,生育友好社会的基石才更牢固。

鼓励生育还需多维发力

水秀为何打了水漂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

8月2日,广西公开通报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。其中一起是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未经科学论证,脱离县情实际上马“水秀”和“灯会”旅游项目。因前期投资风险评估不充分,这一投资2230万元的文旅项目,最终以“水秀”项目闲置、“灯会”项目拆除惨淡收场。

形象工程的危害早已被反复印证。本应用于民生改善和产业升级的资金被挤占,大量资金投入华而不实的项目中,忽视基础设施配套、产业合理布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,这种资源错配,不仅损害了群众利益,也阻碍了地方发展。面子工程往往还会成为腐败的温床,在项目决策、资金拨付、工程施工等各个环节,都可能存在权力寻租、利益输送等问题,败坏社会风气,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
形象工程为何屡禁不止?一是政绩观错位,一些领导干部,或是作风漂浮,不深入调查研究,仅凭“拍脑门”就作出决策;或是将个人政绩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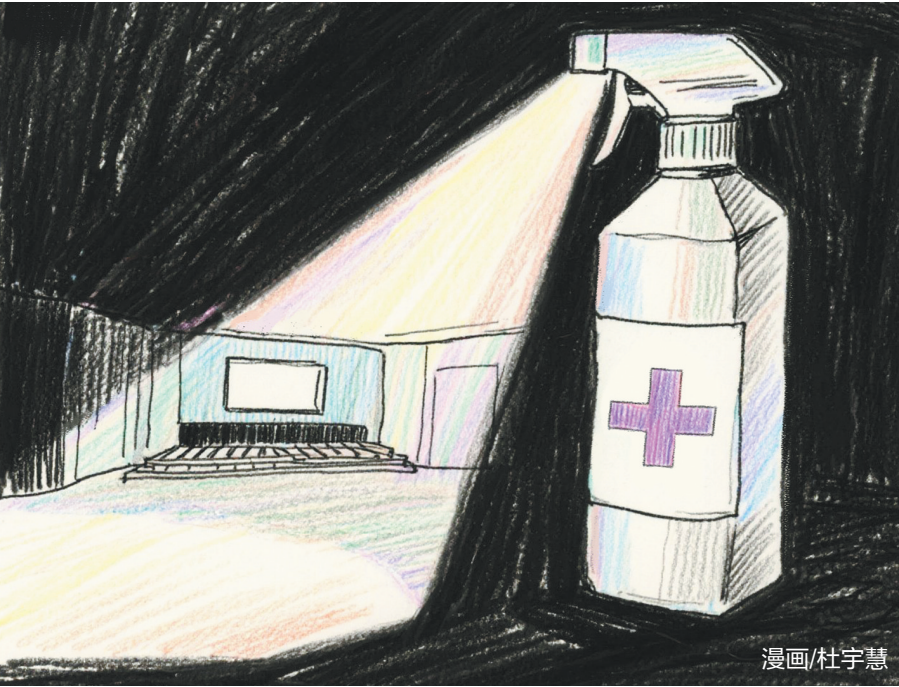
于群众利益之上,追求表面光鲜和“上级关注”,忽视了实际效果和民众需求。二是决策机制漏洞,像富川文旅项目暴露的“未经科学论证”问题,本质上是“一言堂”代替了民主决策,专业意见让位于行政意志。三是监督问责滞后,项目审批时“一路绿灯”,出问题后才“秋后算账”,这种“重建设、轻监管”的模式,无疑助长了“拍脑袋”决策。

整治形象工程,必须下大力气、动真格。完善政绩考评体系,把民生改善、生态保护、债务风险防范等关键指标摆在更重要位置。加强制度建设,强化对重大工程项目全流程、穿透式监管,确保每一项工程都能够经得起检验。强化责任追究,对决策失误、违规操作、腐败行为等严肃问责,让相关责任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
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。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,把心思用在为民造福上,才能让地方经济健康发展,让人民群众真正受益。

时事绘

影院座椅不能成卫生盲区



漫画/杜宇慧

从清华学子成长为抗战先锋

杨学诚 8 条枪起步发展鄂中抗日武装

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金凌云
通讯员 袁丽

在历史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名字熠熠生辉,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朽丰碑。

在省档案馆,有3份抗日英烈杨学诚的珍贵档案,记载了他从“书生”到“战士”的传奇人生。

19岁的他,从湖北黄陂考入清华大学,成为学生运动领袖。23岁时,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,毅然回到鄂中农村,以8条枪为基础建立抗日武装。1944年日寇“扫荡”鄂边抗日根据地大悟山时,他带病转移,最终牺牲,年仅29岁。

翻开尘封的档案,一位饱含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青年战士形象,浮现在我们眼前。

从“书生”到“战士”

“他敦厚朴实、样子有点像农民……红红的脸庞上,有一对坚毅活泼的眼睛。”省档案馆馆藏1950年东北日报刊登一篇纪念杨学诚的文章中,描绘了他的样子。

文章记载:抗战期间,在南下宣传团第三团中,他“打前站”,每天跑到前边去给下边宣传的同学们准备茶饭和房子。赶路的时候,他总是竟走式地半跑半走,像一个大孩子似的,常常跑得头发上冒着热气,可是每到一地方,他仍然是被很多农民、学生包围着,听他讲当时中华民族的危机、痛斥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。有很多人听了他大声疾呼的讲演,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杨学诚是湖北黄陂人,1915年出生于黄陂研子岗罗村一户普通家庭。他自幼好学,成绩优异,1930年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,1934年又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。

从农村走进清华学堂,十分不易。刚入校时,杨学诚埋头读书,每天夹着书本按时上课,按时到图书馆,平时沉默寡言,也不参加课外活动,是一个“安分守己”的好学生。

但当时的中国,正值民族危亡之际。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三省后,进一步将魔掌伸向中华大地,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

1935年,南京国民政府签订“何梅协定”“秦土协定”,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、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。成千上万富



杨学诚。(新华社发)

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,在时代风暴下警醒和震荡起来。

一二·九学生运动中,杨学诚同数千名学生一起,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包围,面对带血的大刀、军棍以及冰冷刺骨的水龙头,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,振臂高呼,呼吁抗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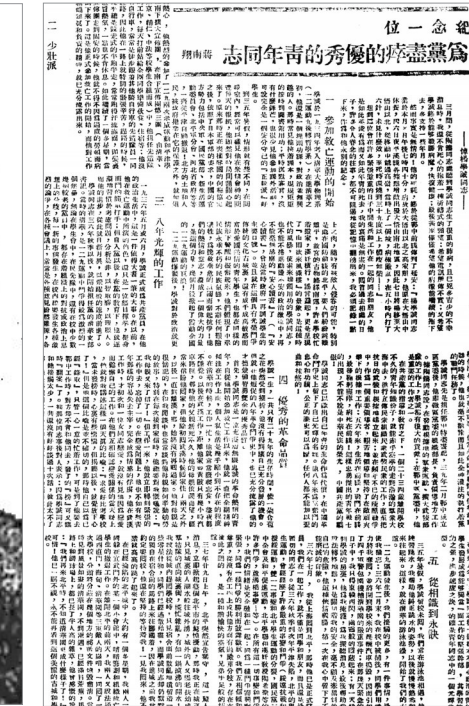
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,开始成为一名“战士”。1936年5月,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。9月,他开始担任当时的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。

就算讨饭也要跟鬼子干

1937年7月北平失守,杨学诚组织学生撤离,9月抵达武汉。

回到家乡,杨学诚把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共产党员、民先队队员联络在一起,办补习学校,号召大家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。

南京沦陷后,流亡到武汉的学生越来越多,杨学诚等发起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,



1944年8月9日,解放日报刊登纪念杨学诚的文章。(省档案馆供图)

建立30多个宣传队,派往各地宣传抗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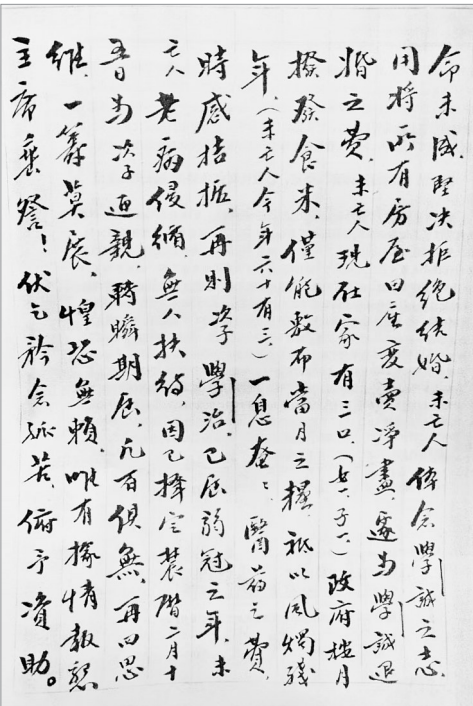
1938年6月,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指示,杨学诚赴鄂中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。

档案记载,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时,那里一共只有十几个党员,基础很薄弱。

杨学诚到鄂中后即与一同被派往鄂中的陶铸深入农村,积极组织抗日武装,开展敌后游击战争,建立抗日根据地。在应城夏家庙,他们培训抗日骨干300余人。

杨学诚千方百计抓武装,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力量。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前夕,杨学诚在潘家集主持了为期三天的鄂中特委扩大会议。在会上,他深刻分析了整个抗战的形势,特别是鄂中的形势,提出“就是讨饭,也要讨到一支枪,拿起枪去跟日本鬼子干”。

在杨学诚的组织领导下,人人动手搞枪。当时有一名党员拿出1000多块银圆,通过各种途径,买到了德国造快慢机一支、驳壳枪一支、勃朗宁小手枪一支和仿制汉阳造步枪四支,子弹半箱,手榴弹十八枚,加上他家原有的



杨学诚的母亲写给湖北省政府的信。(省档案馆供图)

一支金陵造小手枪,组成了一支八条枪、十多人的抗日武装,这就是有名的“应城八条枪”。

省档案馆馆藏一份1944年的解放日报记载:曾经领导过鄂中工作的钱瑛同志说,鄂中建立武装是从八条破枪开始的。当时对那八条枪,学诚同志爱惜如命,晚上睡觉都带在自己的身边。在情势紧张的时候,他更是警惕小心,生怕枪支被人偷去或抢走,常常亲自站岗守夜,护卫那几支破枪。

带病坚持着战斗

杨学诚带着这支从八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,向日寇开了火,而且打了胜仗。

1938年秋天,杨学诚他们就在汉水附近缴获了敌人一条运输船,而且活捉了两名伪军、一名日本鬼子。

在杨学诚的指挥下,这支从八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,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“应抗”支队。

档案解密

(第149期)



湖北日报
省档案馆 合力